

元大都西太乙宫考

——北京西城区后英房和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文物研究

On the Western Taiyi Palace of Khanbaliq:
Research on the Relics of the Houyingfang and Houtaoyuan in the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林梅村*

Lin Meicun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内容提要: 1972年,北京西直门内后英房胡同明北城墙下发现元代建筑遗存。后英房遗址采用皇家寺观特有的工字型建筑,并出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琅琊紫金砚。该遗址正是元末熊梦祥《析津志》所载西太乙宫遗址,由元初昭瑞宫扩建而成。不过,据揭傒斯《砚山诗序》西太乙宫提点张秋泉并非熊梦祥所言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之后,而是南宋末平江(今苏州)知府戴觉民之子。西太乙宫四任提点分别为玄教第二代宗师吴全节、南宋戴觉民后人张秋泉、武冈(今湖南武冈)延寿宫道士饶礼诚,以及蒙古族道士张彦辅。宫廷画师商琦曾为西太乙宫正殿绘制山水壁画,并有翰林院大学士揭傒斯题诗。距后英房遗址125米的后桃园遗址出土元代壁画残片,当即商琦所绘西太乙宫山水壁画。后英房遗址出土《广寒宫图》螺钿黑漆盘残片产自浙江南部,当即张秋泉从家乡带到京城的手工艺品。

关键词: 元大都考古 后英房遗址 张秋泉 昭瑞宫 西太乙宫 商琦绘山水壁画

Abstract: In 1972,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Khanbaliq are excavated beneath the north wall of the Ming city at the Houyingfang site northeast of Xizhimen in Beijing. The Houyingfang site are featured by the H-shaped plan of the royal architecture. An unearthed inkstone from this site is identified to the treasures of Mi Fu, a calligrapher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belong to the royal Taoist temple known as Western Taiyi Palace, which is recorded in the geography section (*Xi Jin Zhi*) compiled by Xiong Mengxiang of the late Yuan Dynasty. This temple was an expansion based on the Zhaorui Palace in the early Yuan. However, Xiong's description to Zhang Qiuquan, the procurator of Western Taiyi Palace, was wrong. He actually is the son of Dai Juemin, the governor of Suzhou at the end of South Song Dynasty, rather than the son of Dai Fugu, an itinerant poet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four procurators of Western Taiyi Palace: Wu Quanjie (the second grandmaster of Mystery School of Taoism), Zhang Qiuquan (posterity of Dai Juemin), Rao Licheng (the Taoist priest of Yanshou Palace at Wugang of Hunan), and Zhang Yanfu (a Mongolian Taoist priest). The

*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

landscape mural in the hall of Western Taiyi Palace was painted by Shang Qi, an imperial painter, and was with an epilogue poem by Jie Xisi, a member of Imperial Academy. This can be demonstrated by the Yuan mural fragments unearthed from the Houtaoyuan site, 125 meters away from the Houyingfang site. The unearthed fragments of the lacquer painting with mother-of-pearl inlay, *The Guanghan Palace*, were a craft manufactured in South Zhejiang. It therefore can be suggested that it was brought by Zhang Qiuquan from his hometown to Khanbaliq.

Key Words: Archaeology of Khanbaliq; Houyingfang Site; Zhang Qiuquan; Zhaorui Palace; Western Taiyi Palace; Landscape Mural by Shang Qi

1972年,元大都考古队在北京西城区后英房胡同明北城墙下发掘了一处元代遗址。据元末熊梦祥记载:“西太乙宫,在和义门(今西直门)内近北,张秋泉所建。”后英房遗址就在西直门东北不远处,采用皇家寺观特有的工字型建筑,并出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琅琊紫金砚(图1),正是熊梦祥所言西太乙宫遗址。

据我们调查,西太乙宫创建者张秋泉,实乃南宋末平江知府戴觉民之子,以宝藏米芾砚山石而闻名于世。遥想当年,西太乙宫群贤毕至,虞集、赵孟頫、揭傒斯等文人雅士纷纷为砚山石赋诗唱和,堪称元大都最重要的中国文化传播中心之一。宫廷画师商琦曾为西太乙宫正殿绘制壁画,并有翰林院大学士揭傒斯题诗。遗憾的是,这个重大考古

发现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迄今未被学界充分认识。我们先从米芾琅琊紫金砚谈起。

一、米芾琅琊紫金砚流传始末

1972年,北京西城区后英房胡同明北城墙下元代遗址出土了一方凤字形紫金砚。砚铭有米芾落款“元章”,正是这位北宋书法家多次提到的琅琊紫金砚。北宋文坛领袖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官场失意。晚年因新党执政,贬至惠州,又被一叶孤舟流放到儋州(今海南岛西北),宋徽宗时才获大赦北还。从岭南北归途中,苏轼到真州(今江苏仪征)拜访米芾。他对老友新获的一方紫金砚爱不释手,米芾只好借给他赏玩。不料,苏轼临终前却嘱托儿子将此砚当作陪葬品入殓,米芾听罢立即索回。

米芾随笔一则,记述了这个故事,今称《紫金研帖》。纸本,行书,纵29厘米,横40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2)。米芾在帖中写道:“苏子瞻(苏轼字)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1]这方紫金砚是米芾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好不容易得手的。他在《乡石帖》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元章。”^[2]王羲之,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晚年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3]。所谓“紫金右军乡石”,即王羲之家乡的紫金石。《乡石帖》,纸本,行书,纵28.2厘米,横30.5厘米(图3),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米芾还有《杂著》一则,评述这方紫金砚。原帖下落不明,拓本见于清代《月虹楼法帖》。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在《仿米海岳杂录》手卷临摹过此帖(图4),字释为:“吾老年方得



图1 后英房遗址出土米芾琅琊紫金砚



图2 米芾《紫金研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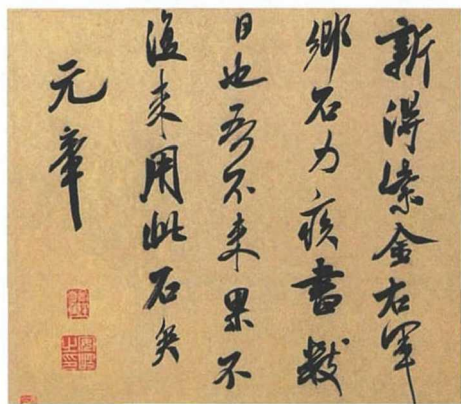


图3 米芾《乡石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琅琊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研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唐皆出其下。”^[4]

四库版《宝晋英光集·杂著》录文作：“吾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研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歛皆出其下。”^[5]米芾将晋唐古砚称作“研”，而本朝则称“砚”。如米芾《画史》云：“古书画皆圆，盖有助于器。晋唐皆凤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头瓦安三足尔。墨称螺，制必始蛤粉，此又明用凹砚也。一援笔，因凹势，锋已圆，书画安得不圆？本朝砚始心平如砥，一援笔则褊，故字亦褊。”^[6]四库刻本将原文“研”字改为“砚”，又将原文“端唐”改为“端歛”^[7]，皆误。

地不爱宝。1972年米芾所藏琅琊紫金石居然在北京西城区后英房胡同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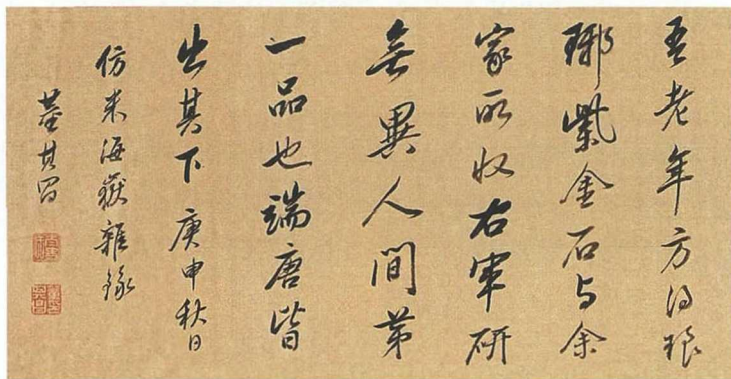


图4 董其昌《仿米海岳杂录》绫本手卷局部

北城墙下重见天日。据发掘者介绍，这方紫金石出自后英房遗址主院东厢房。“除生活用具之外，还发现了很多种属于所谓‘文玩’一类的东西，它们大部分散乱地弃置在主院东挟屋的砖地上。有紫端石风字砚一方，长22.7、宽17.5厘米，砚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的墨痕，石质很好。出土时已残破。砚背面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文曰：‘此琅琊紫金石，所困易得，墨在诸石口口口永口口口，皆以为端口也。’下面落款为‘元章’二字。”^[8]

研究者对此砚残铭（图5-1）有不同解读方案。我们建议读作：“此琅琊紫金石所/圃，易得墨，在诸石/囡囡。圃永/圃囡囡，皆以为端，/圃也。元章。”第二行“制（製）”字尚存最下一笔；第三行“唐”字仍存下半字“口”部；第四行第一个“以”字残存最后一划。第二行“易”字和第五行“元章”二字，与米芾《萧闲堂记》拓本（图5-2）所书“易”和“元章”三字如出一辙，必为米芾书法真迹无疑。

紫金石产自王羲之家乡琅琊（今山东临沂）。据宋代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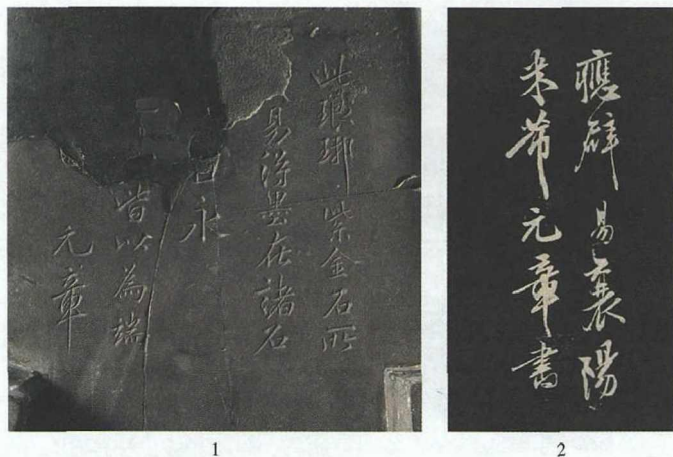


图5 米芾琅琊紫金石局部与米芾《萧闲堂记》局部

高似孙《砚笈》记载，“紫金出临朐（南与临沂相邻，今属山东淄博），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姿殊下。晚唐竞取紫金石，芒润清响，国初已乏”^[9]。米芾根据顾恺之画中所绘晋砚样式，用琅琊紫金石造过一方凤字双足仿古砚。他在《砚史·样品》中写道：

晋砚，见于晋顾恺之画者，有于天生叠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圆铜砚中如螯者。余尝以紫石作之，有上圆下方，于圆纯上刊两窍置笔者，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见于晋人图画。世俗呼为凤字，盖不原两足之制，谓之凤足。至今端州石工，以两眼相对于足傍者，谓之凤足。凤之义，取五色英文，灿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军砚，其制与晋图画同，头狭四寸许，下阔六寸许，顶两纯皆绰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内之制，足狭长，色紫，类温岩，中凹成白。^[10]

后英房元代遗址出土凤字双足砚，正是米芾根据顾恺之所绘晋砚样式，用王羲之家乡石材所造仿古砚。砚背所刻《琅琊紫金砚铭》不见于传世文献，堪称中国书法史一大发现。

二、昭瑞宫之谜

发掘者将元大都后英房遗址定性为“元代居住遗址”，目前学界多从之。不过，从地理位置、建筑形制和出土文物看，我们认为该遗址实乃元大都西太乙宫故址（图6）^[11]。《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

西太乙宫，在和义门（今西直门）内近北，张秋泉所建。秋泉本戴石屏（戴复古号）之后，少年习吏，微贵，弃俗而游京师。自历涉艰，曾无悔色。

为人美丰姿，长髯，真一代之奇士。宜乎晚节可观。初，秋泉居京，当时名公巨卿，无不倾盖相亲。为人倜傥，有旷愁高蹈之志。所藏法书、名画甚富。章子有（张九思）平章尤为亲厚。初，在天师宫放逸自居，怀孟太后（海山汗之母答己）有疾，求医药符篆之士于朝，遂取于吴宗师（吴全节）。师令其应旨而往，符药俱验，果能阐扬，大称懿旨。厥后恰逢九五之祚（指武宗登基），一时向仰，非复寻常真人之比。故其所建宫宇，计年而成，其施助不言而至源源。宫（西太乙宫）正殿正西祠张上卿（张留孙），吴宗师实开山之主也。后以年迈归，以所蓄书画财物，尽数付与吴宗师。独携米南宫（米芾）所宝研山石回。当朝诸名公若虞伯生（虞集），俱有《研山诗》。^[12]

戴石屏即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字式之，台州黄岩（今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人。生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常居南塘（今浙江温岭市新河镇塘下村）石屏山，自号“石屏”。一生不仕，浪游江湖，曾从陆游学诗，后归家隐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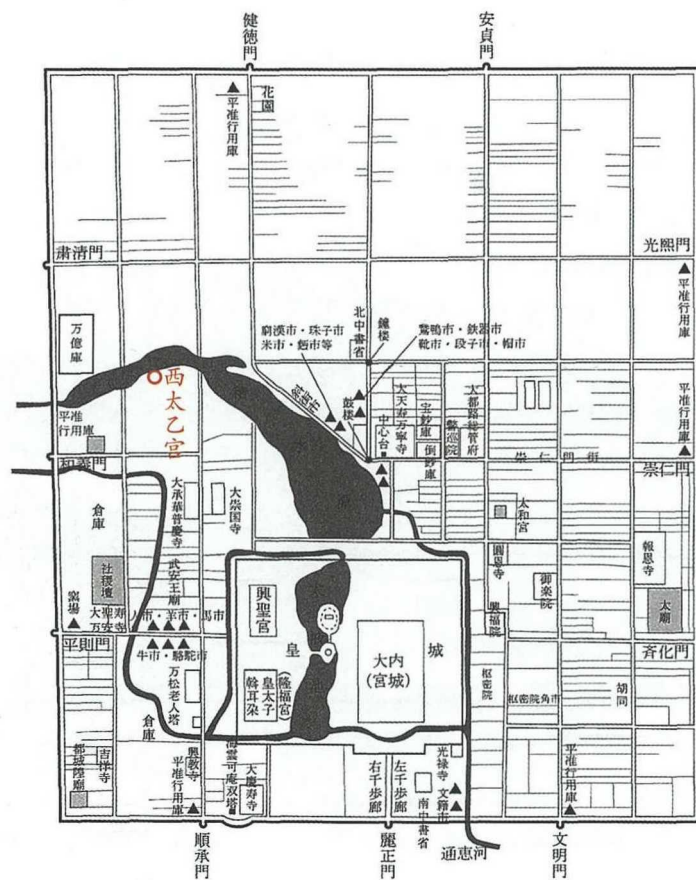


图6 元大都西太乙宫地理位置
据包慕萍所绘元大都平面图改绘

卒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享年八十一岁^[13]。

关于张秋泉的身世，揭傒斯《砚山诗序》提到：“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张秋泉），本戴氏子。”^[14]戴复古有二子。如果他20岁娶妻生子，那么长子生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87年）。大德十一年（1307年）西太乙宫创建之际，戴复古长子至少120岁。显然，张秋泉绝非戴复古之子。

有记载表明，张秋泉之父或为戴复古同乡戴觉民。清戚学标《台州外书》记载：“戴觉民，字希尹，黄岩人，家塘下（亦称‘南塘’）。景定三年进士，授两浙添差干官，转国史检阅、浙西提举，除礼部郎中兼军器大监，与贾师宪（贾似道字）同乡郡。无所附和贾执政，不得有所建白。德祐元年四月，以直秘阁权知平江府（今苏州）。八月召赴行在（今杭州），将大用而国事已不可为矣。觉民精治史传，风雅动一时。”^[15]戴觉民以编刻宋本《李白诗集》而闻名于世。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儒学教谕时，知州江万里延请戴觉民编刻《李翰林集》^[16]。张秋泉博学多才，出自江南书香门第之家，俗姓戴氏，当为南宋末平江知府戴觉民之子。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三月，伯颜率元军攻入南宋临安（今杭州），张秋泉仕途之梦随之破灭。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至元十七年被玄教大师张留孙推荐入京。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记载：“士大夫赖公（张留孙）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17]张留孙为皇后祷病有验，于是元世祖“乃诏两都各建上帝祠宇，皆赐名曰崇真之宫，并以居公，赐平江、嘉兴田若

千顷，大都、昌平栗园若干亩给其用”^[18]。崇真宫全称“崇真万寿宫”，至元十四年在大都新城蓬莱坊（今北京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3号）落成，俗称“天师宫”^[19]。至元十七年，玄教大师张留孙“奉诏祠名山川，给驿马五十，令访遗逸以进”^[20]。虞集《张宗师墓志铭》记载：“岳、渎既皆在天子封内，即使近臣从公遍祠名山大川，访问遗逸，敕百官钱之国南门。比还，所荐论，上皆以名召用。”^[21]据此，戴觉民之子赴元大都“天师宫放逸自居”，取教名“张秋泉”，当在至元十七年张留孙赴江南为朝廷搜访遗逸之士之际。

张秋泉亦名“张惟一”，西太乙宫创建前曾任元大都昭瑞宫提点。袁桷《昭瑞宫提点张惟一特授全德靖明弘道真人太一宫提点》记载：

神以知来，至教匪存于象设；人惟求旧，褒封首锡于龙飞。念扈辟之宣勤，默储祥而介福。坤元具训，涣号扬纶。昭瑞宫提点张惟一，泉石古心，冰霜雅操。侍晨长乐，澹焉若朴而妙感彰；澄观穆清，廓乎不惊而众虚集。惟才全者德不竞，而正靖者明愈昭。阐道王庭，葆真冲馆。噫！有国之母以长久，尔尚谨于祝厘。立天之道曰阴阳，当益思于观复；恭承嘉命，助赞无为。可^[22]。

大德九年（1305年），成宗病危，立答己子海山汗为太子。成宗第二任皇后卜鲁罕欲专权，为防止海山汗即位，便将母子二人迁到怀州。《元史·仁宗本纪》记载：“仁宗圣文钦孝皇帝，讳爱育黎拔力八达，顺宗次子，武宗之弟也。母曰兴圣太后（答己），弘吉刺氏。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冬十月，成宗不豫，中宫秉政，诏帝与太后出居怀州。十年冬十二月，至怀州。所过郡县，供帐华侈，悉令撤去，严飭扈从毋扰于民，且谕金事王毅察而言之，民皆感悦。”^[23]怀州，在今河南沁阳，海山汗与生母答己的流放地，或称怀孟。故《析津志辑佚》称答己为“怀孟太后”^[24]。大德十年（1306年）冬，张秋泉受玄教宗师吴全节之命，为太后医病，结果“符药俱验”，“大称懿旨”，那么张秋泉擢升昭瑞宫提点当在赴怀州为海山汗之母答己治病后不久。

昭瑞宫不见于《析津志辑佚》《宛署杂记》等元明北京地方志，唯王冕客居大都时作《遇昭瑞宫次韵》二首，对这所道观略有所述。

其一

红花翠竹满江皋，依约仙山驾巨鳌。
月下每听来鹤佩，云中时复见龙袍。

西江日薄潮声小，北极天开王气高。
咫尺山河移版籍，书生徒尔说英豪。

其二

金屋无人玉殿开，青蒲埋没遍莓苔。
旧愁隐隐随烟浪，新恨绵绵入草莱。
红叶已随流水去，黄门空忆看华来。
东南富贵消磨尽，留得荒村古将台。^[25]

王冕，浙江绍兴人，先后两次北游大都。第一次是延祐四年（1317年）赴京会试，颇受赵孟頫的赏识，并为他作画《古木幽禽图》。图后黄公望题跋^[26]。会试失败后，王冕遍游名山大川，结交天下文士。至正七年（1347年），王冕再次北游大都。徐显《稗史集传》记载：“（王冕）遂北上燕蓟，纵观居庸、古北之塞，主（住）秘书卿达公兼善（泰不华字）家，翰林诸贤，争誉荐之。……至正戊子（至正八年），南归。”^[27]

然而，昭瑞宫在元大都什么地方，文献语焉不详。后英房遗址的发现将有助于揭开这个谜。据发掘者介绍，后英房遗址由东院、主院、西院三组建筑组成。三者相互交错，并非同一时期建筑。由于金中都遭到严重破坏，忽必烈迁都燕京后，居住在北郊金代离宫——大宁宫。至元四年，忽必烈开始在金中都东北建新城，史称“大都”（突厥语Khanbaliq，“汗八里”）。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元大都宫殿、宫城墙、太液池西岸隆福宫（太子府）、城内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外郭城墙、金水河、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续竣工。于是忽必烈诏令：“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贵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

室。”^[28]可知，西太乙宫的建造不早于至元二十二年。

从现存遗址平面图看，在后英房遗址南面似乎还应有一至两层院落。它的北面或有后园。从南边大门开始，至后园为止，应相当于元大都两个胡同之间的距离（约87米），并未超过民宅占地八亩之限。值得注意的是，东院采用元代宫殿或皇家寺观特有的工字型建筑，主要建筑比主院位置偏北，四周有围墙，独自形成一个封闭式院落（图7）^[29]。我们认为，后英房遗址东院即昭瑞宫故址，而主院和西院则为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敕建的西太乙宫。

元代道教建筑与佛教寺庙类似，有皇家和民间寺观之分。所谓“宫”者，或由皇家出资建造；或由上层人士出资建造并由国家赐额，如至元七年察必皇后在高粱河畔所建真武庙称作“昭应宫”^[30]；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在大都蓬莱坊为张留孙所建道观称作“崇真万寿宫”。所谓“观”者，则由民间集资兴建，如大都采石局副使常瑞和提领王秀在由义坊所建真武庙称作“通玄观”。类似的民间道观还有大元福寿兴元观、云岩观等^[31]。

西太乙宫是在昭瑞宫基础上扩建而成，而玄教大师吴全节曾为昭瑞宫首任提点。故《析津志辑佚·寺观》云：“宫正殿正西祠张上卿，吴宗师实开山之主也。”^[32]张秋泉为太后笞己治病有功，大德十一年（1307年）接替吴全节任昭瑞宫第二任提点。邓文原《杭州福神观记》对此略有所述。这是一篇碑记，由赵孟頫篆额并楷书，延祐七年（1320年）立于杭州断桥北福神观（图8）^[33]。

《杭州福神观记》碑早已不存，唯有赵孟頫墨迹存世。纸本，以乌丝界栏，纵34.2厘米，横797.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9）。其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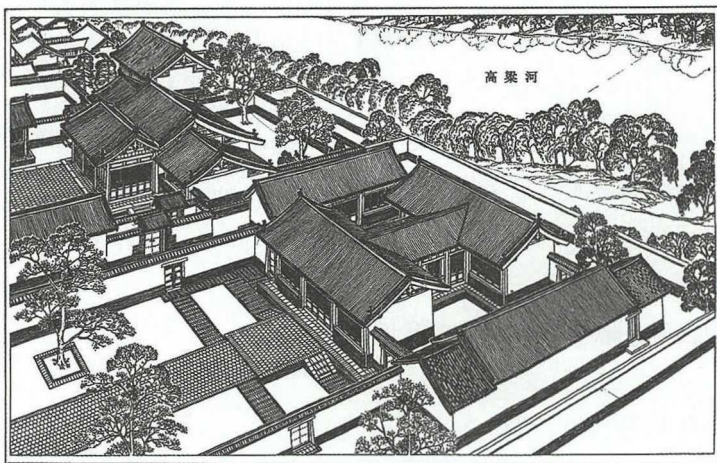


图7 元大都昭瑞宫遗址
傅熹年复原后英房遗址东院图

宋祠太乙神，为官者二。其在孤山者，表曰西太乙宫。宫之北为断桥，桥左为福神观，本宋赵氏故宅。……大德丁未，全德靖明弘道真人张公惟一，荣被玺书，领西太乙宫事。公以祠官祝厘，便蕃锡宠，黄冠羽服。邈自山林来游京国者，公与语，辄少许可^[34]。

大德丁未，即成宗大德十一年，元大都西太乙宫尚未兴建。至大元年（1308年），元武宗敕建西太乙宫，一年落成。于是昭瑞宫提点张秋泉擢升西太乙宫提点。故《杭州福神观记》说张秋泉“大德丁未……领西太乙宫事”实乃“领昭瑞宫事”之误。

三、西太乙宫壁画

至治二年（1322年），元英宗敕令重修西太乙宫。宫廷画师商琦应邀为西太乙宫正殿东西壁绘制山水画，而揭傒斯为这幅壁画题诗。揭傒斯《题集贤商学士所画太乙崇福宫东西壁山水图为张真人作》有诗曰：

东壁山连西壁山，东西相望几孱颜。
浮云晓散分楼观，流水晴闻隐佩环。
雁荡天台明镜里，琴床棋局翠微间。
集贤学士烟霞笔，写向仙家意自闲。^[35]

集贤商学士即商琦，字德符，号寿岩。元初名臣商挺之子，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受父亲商挺的影响，与道教名流来往密切，如教西太乙宫道士张彦辅学画^[36]。据洪再新考证，商琦为太乙崇福宫画东西壁山水的时间，应在至治三年官秘书卿前后^[37]。据我们调查，这件事发生在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虞集《河图仙坛之碑》记载：

（至治）二年，制授公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道广化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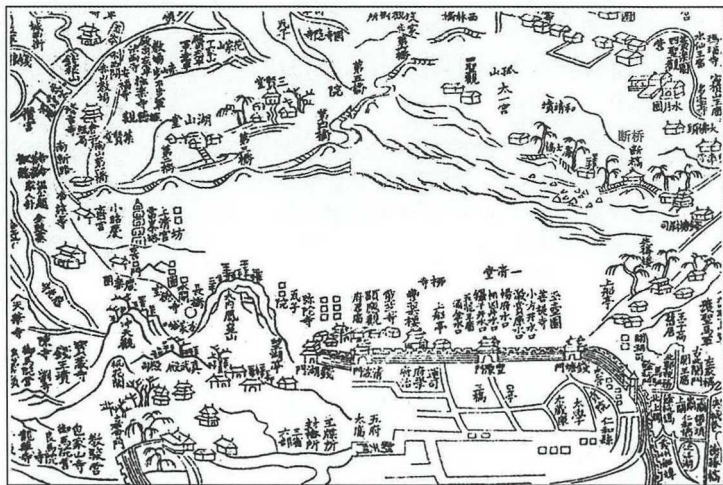


图8 《西湖图》之断桥
《咸淳临安志》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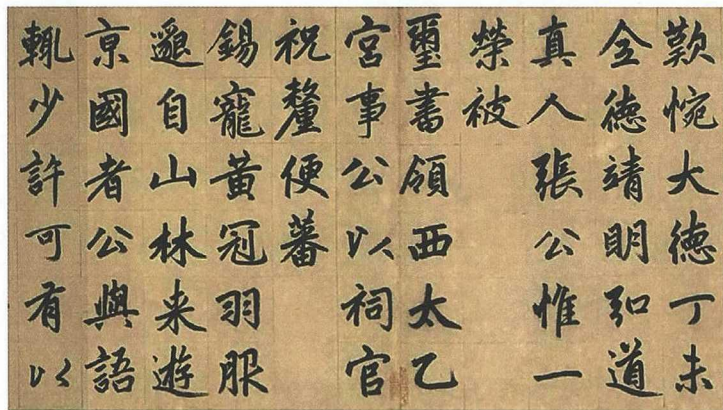


图9 赵孟頫楷书《杭州福神观记》局部

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师主（吴全节）章一，一品银印一，总摄道教事二品银印一，并授之。勅省台百司谕以传宗之事而大护其教，用开府之志作东岳仁圣宫于齐化门外，重修太一延福宫^[38]。

据熊梦祥记载，西太乙宫位于元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内近北。如前所述，这道教官观是在昭瑞宫基础上扩建而成，主院正殿称作“太一延福宫”或“太乙崇福宫”。我们认为，商琦为西太乙宫创作壁画就在至治二年“重修太一延福宫”之际。商琦主要活动于元大德年间至泰定初年，确切生卒年月不详。陈高华认为，商琦在至治三年迁秘书卿后不久即病故，终年不超过五十岁^[39]。大德八年，商琦受到成宗的赏识，并与王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后来的元仁宗）交往密切。成宗以“勋臣子召入备宿卫，仁宗皇帝在春宫，复以充近侍”。此后，商琦以“世家高材，游艺笔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

大德十一年元武宗即位，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同



图10 商琦《春山图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同年，皇太子以春官旨奏于武宗皇帝，升商琦为集贤学士、朝列大夫，后调任大名路总管府治中，不赴^[40]。商琦曾为皇宫嘉禧殿画壁画，并奉诏与李衍一起为僧寺画壁，据说“不得画神鬼”，“不得用金朱涂”，“但令水墨写河岳，苍松赤桧盘根株”。此外，商琦还为达官贵人住宅作壁画山水。据熊梦祥记载，张秋泉与“章子有平章尤为亲厚”^[41]。章子有即张九思，字子有，世祖和成宗朝任中书平章政事，主管东宫事务^[42]。商琦为西太乙宫作壁画似为张九思推荐。商琦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比揭傒斯年长一岁，那么商琦为西太乙宫绘壁画时年五十一岁，而揭傒斯为此画题诗时年五十岁。如今这些壁画和题诗早已不存，不过，商琦有传世之作《春山图卷》，可领略这位元朝宫廷画师的非凡功力。绢本设色，纵39.6厘米，横214.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10）。

据考古简报，后英房遗址“主院的三座角门两旁均立挟门柱，柱中间下设木地袱。……在角门附近还发现了一些长19、宽6.8、厚1.7厘米的小型华头筒瓦，兽面纹和花草纹瓦当的直径6.8厘米，花草纹滴水宽9厘米；还有一些高约14厘米的迦楞频伽和走兽等，这些都可能是角门屋顶上的瓦件”^[43]。

后英房遗址未见壁画遗迹，但在西边不远处后桃园遗址发掘出许多壁画残

片^[44]。后桃园遗址“位于新街口豁口以西明清北城墙下，东距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约125米许。遗址在明初修筑城墙时，即遭严重破坏，故现仅残留一些碎砖破瓦，房屋建筑及基础早已无存。遗址中出土不少元代建筑构件。如：覆盆式柱础、錠脚石、门砧和壁画残片，以及屋顶各种瓦饰。如：鸱尾、迦楞频伽、武士、兽面纹和花草纹瓦当、凤鸟纹和花草纹滴水及各式华头筒瓦等”^[45]。既然后桃园遗址不见“房屋建筑及基础”，而瓦当、滴水和迦楞频伽脊兽等建筑材料又与后英房遗址所出相同（图11），那么后桃园遗址当即后英房元代遗址拆除的建筑垃圾堆放场。显然，后桃园遗址出土壁画残片就是宫廷画师商琦为西太乙宫所绘壁画残片。

四、西太乙宫出土《广寒宫图》螺钿黑漆残片与二郎神牌位

如前所述，揭傒斯曾为西太乙宫壁画题诗，可见他与张秋泉的关系非同寻常。据我们调查，他们俩至少还有过两次交往。揭傒斯与张秋泉第二次交往是为砚山石赋诗。揭傒斯《砚山诗》序云：“山石出灵壁，其大不盈尺，高半之。中隔绝涧，前后五十五峰。东南有飞磴横出，方平可二寸许，凿以为砚，号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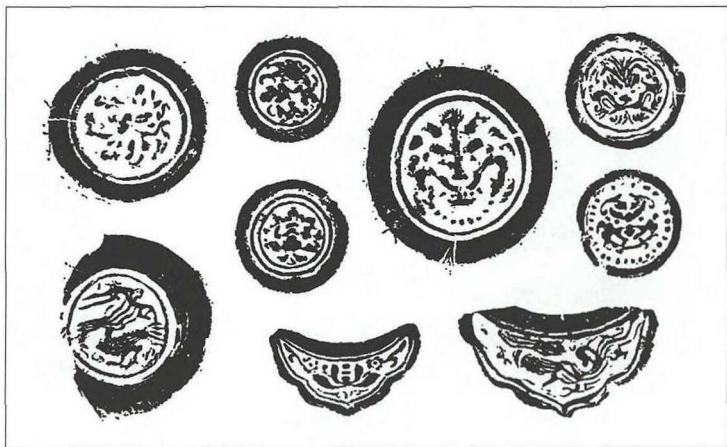


图11 西太乙宫(后英房遗址)出土瓦当和滴水

砚山。在唐已有名，后归于李后主。主亡，归于宋米芾。元章刻其下，述所由来甚详。宋之季，归于天台戴运使觉民，后又归其族人。宰相贾似道求之弗与。携持兵乱间，寢处与俱，遂获全。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本戴氏子，今年春始书得之，请予赋诗。”太乙崇福宫即西太乙宫正殿，而张真人即戴觉民之子张秋泉。揭傒斯《砚山诗》曰：

何年灵壁一拳石，五十五峰不盈尺。
峰峰相向如削铁，祝融紫盖前后列。
东南一泓尤可爱，白昼玄云生霏霏。
在唐已著群玉赋，入宋更受元章拜。
天台瀕洞云海连，戴氏藏之余百年。
护持不污权贵手，离乱独与身俱全。
帝旁真人乘紫霞，尺书招之若还家。
阴崖洞壑寒谿研，宛转细路通褒斜。
昆仑蓬莱与方壶，坐卧相对神仙居。
硬黄从写黄庭帖，汗青或抄鸿宝书。
秦淮咽咽金陵道，此物幸不随秋草。
愿君谷神长不老，净几明窗永相保。^[46]

据发掘者介绍，后英房元代遗址“还发现了一件用五光十色的鲍鱼壳镶嵌成的螺钿漆器。……而元代的平脱薄螺钿漆器在考古发掘中这还是第一次发现”。所谓“螺钿”，指用螺壳与海贝进行拼接、镶嵌、打磨，最终在漆器表面形成人物、花鸟、山水、文字的艺术品。

明代漆工杨明在为《髹饰录》作注时写道：“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所谓“古者”，指明以前之物。而“今者”指明代之物。因为螺钿壳片取材于螺、老蚌、车螯、玉珧等各种不同贝壳，原材料本身有厚有薄，研究者依据文献和现有实物中螺钿厚薄程度，将其分为厚螺钿与薄螺钿两种。较厚的螺片镶嵌器物，称为“厚螺钿”。

因钿片厚、硬度大，又称“硬螺钿”。元代以前的螺钿漆器，螺片一般较厚，属于“厚螺钿”范畴。不过，后英房遗址出土《广寒宫图》螺钿黑漆残片，色彩缤纷，嵌法完全达到了薄螺钿“分截壳色，随彩而施缀者，光华可赏”的艺术效果，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薄螺钿工艺品（图12）^[47]。

关于这件黑漆螺钿漆盘产地，发掘者推测，“从这件漆器画面中建筑物的屋角上翘等式样来看，是我国南方的建筑形式；另外，画面的作风又与当时福建建阳木刻板画的作风极为相似。从以上各种情况看来，这件螺钿漆器可能是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的产品”^[48]。张秋泉正是浙江南部黄岩人，那么这件螺钿黑漆盘^[49]或为张秋泉从家乡带到京城的。

揭傒斯曾赋诗一首，描绘一位黄姓漆工凭借自己精湛的工艺，在大都城游走豪门，题为《赠髹者黄生》。其诗曰：

髹髹肇有虞，大朴已雕刊。纷纷百代下，巧密何多端。
黄金间毫发，文螺错斓斑。竹树冠台殿，祥云随风鸾。
五采被床几，岂独匣与盘。坐使圭壁暗，所好移所观。
黄氏擅良工，出入三十年。驰誉必名流，迎致皆上官。
美贾一朝起，群工那可班。艺绝诚足贵，古道何由还。^[50]

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教授考证：“颇有趣味的是，揭诗描述的黄生作品居然与后英房遗址出土的残盘相似多多。揭诗称‘文螺错斓斑’，残盘图案色彩斑斓；揭诗说‘竹树冠台殿，祥云随风鸾’，残盘可见楼阁、树木、云气，揭诗云‘岂独匣与盘’，这件器物正是盘。因此，虽然不必说残盘当年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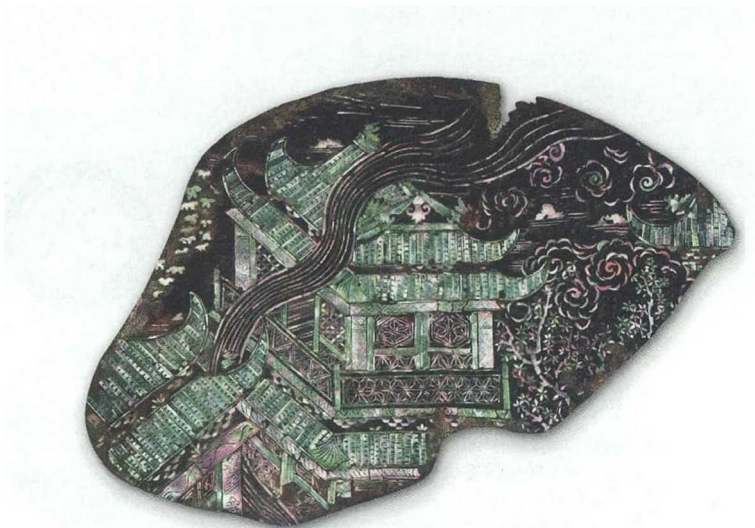


图12 后英房元代遗址出土《广寒宫图》螺钿黑漆残片

出自黄生之手，但指其作者为黄生一派，显然不成问题。”^[51]如前所述，揭傒斯不仅为张秋泉砚山石赋诗，而且为西太乙宫壁画题诗。因此，这首诗描述的螺钿漆盘当即张秋泉藏品，从而披露了揭傒斯与张秋泉第三次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后桃园遗址还出土了一件用于镇水的道教文物，亦为西太乙宫（后英房遗址）之物，现藏首都博物馆。这是一件元代小石碑，下有龟趺（图13），通高28厘米，碑身阴刻“昭惠灵显真君之位”两行八字。碑首天官处阴刻“六月廿四”，字均填金^[52]。昭惠灵显真君，是宋代给秦国水利专家李冰次子的封号，俗称“二郎神”。《宋会要·礼二十·郎君神祠》记载：“仁宗嘉祐八年八月，诏永康军广济王庙郎君神，特封灵惠侯，差官祭告。神即李



图13 后桃园出土昭惠灵显真君之位碑
首都博物馆藏

冰次子，川人号护国灵应王，开宝七年命去王号，至是军民上言，神尝赞助其父除水患，故有是命。……政和八年八月改封昭惠显灵真人。”^[53]

北宋以来，每逢二郎神生日汴梁都要举办大型庙会，热闹非凡。《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无盛如此。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如毬杖、弹弓、弋射之具、鞍辔、衔勒、樊笼之类，悉皆精巧。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太官局供食，连夜二十四盞，各有节次。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至夕而罢。”^[54]可知首都博物馆藏昭惠灵显真君之位碑上“六月廿四”是二郎神的生日。

唐开元年间崔令钦《教坊记》提到唐代戏曲有“二郎神”。据任半塘考证，二郎神的来源有二说：“秦李冰次子在蜀之灌江，隋赵昱在吴之灌口，均以灵异，被称为‘二郎神’。”^[55]张政烺进一步考证：二郎神信仰的缘起与唐代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有关。唐玄宗以后，毗沙门天王信仰大行于世，其次子独健也受到人们尊崇。二郎神后来将几种民间神，如李冰子、赵昱、张仙、杨戩归并混合而成^[56]。元代二郎神崇拜沿袭了宋代李冰次子及赵昱两种说法。由于元代杂剧在民间有广泛影响，赵昱说颇为盛行，但元代官方认可的二郎神却是李冰次子。《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57]后桃园出土昭惠灵显真君之位碑即元代官方认可的李冰次子二郎神牌位，西太乙宫道士用来祈祷元大都免于水患。

五、西太乙宫西配殿之天师祠与玄教宗师像

据发掘者介绍，后英房遗址“西院的南部已大部分破坏，仅在北部尚存一小月台。月台南端正中及东侧各砌一踏道。月台的东南、西南两角上各浮放一狮子角石，这两个角石并未砌在月台之内，因此，它很可能是从别处暂时移置于此的。月台北面尚存台基的东部及房屋的东南柱础。台基略低于主

院的大台基，它的东南角与大台基的西北角互相错入，都缺了角石的部分（图14）”^[58]。

《析津志辑佚·风俗》记载：“都中显宦税硕之家，解库门首，多以生铁铸狮子。左右门外连座，或以白石凿成，亦如上放顿。若公府月台上，两南角亦如上制。”^[59]正如发掘者指出的，后英房遗址“主院大台基和西院小台基互相错入，东院东厢房北头有拆改等情况来看，此处建筑自兴建至废毁虽然只有五六十一年，但在此期间，似乎也还经历了一些变动。西院的北房和台基则是后来添盖的，因而就出现了三个院落并无统一安排的现象。特别是西院月台两南角上竟按照公府、寺院的制度放着两个狮子角石”^[60]。

至治元年（1321年）十二月，张留孙卒于大都，享年七十四岁^[61]。张留孙羽化后，吴全节承袭师职，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全节秉承师志，用六年时间在元大都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外建成东岳庙大殿、大门、东西两院，并塑有道教神像，朝廷赐名“东岳仁圣宫”。东岳庙东配殿供奉有玄教开山祖师张留孙塑像^[62]。除东岳庙之外，吴全节还于至治二年重修西太乙宫。这项工程对西太乙宫作了两项重要改进：第一，延请宫廷画师商琦为西太乙宫正殿东西壁绘制山水画，并由揭傒斯为壁画题诗。第二，在西太乙宫正殿之西建张留孙祠堂（图15）。《析津志辑佚·寺观》云：“宫正殿正西祠张上卿，吴宗师实开山之主也。”^[63]可知，西太乙宫西配殿奉祀玄教开山祖师张留孙像。延祐四年（1317年），张留孙七十大寿。元仁宗诏令宫廷画师为他画像，并设宴祝寿。虞集《张宗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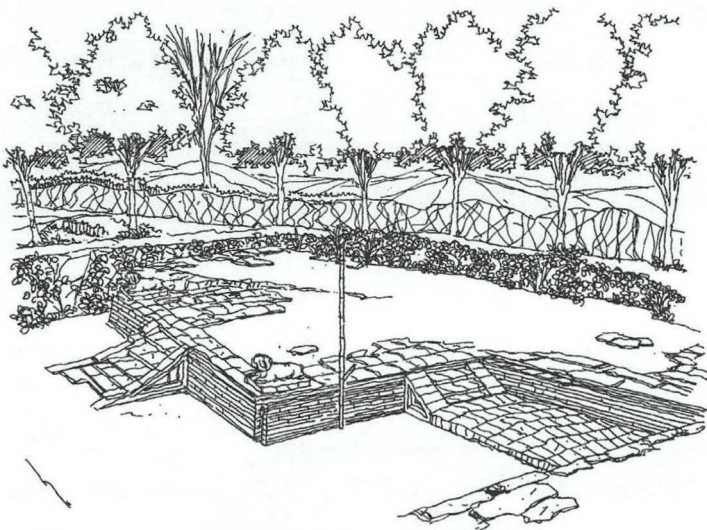


图14 西太乙宫西院天师祠遗址图
郝春阳据后英房遗址发掘现场照片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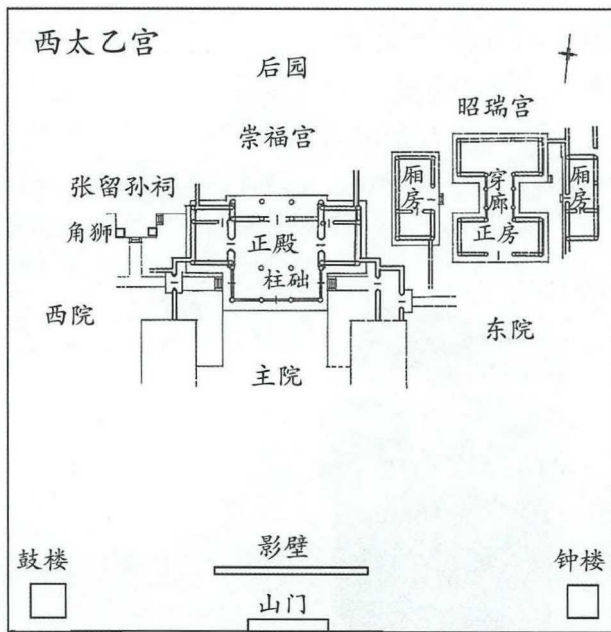


图15 元大都西太乙宫(后英房元代遗址)平面复原图

墓志铭》记载：“上使国工画公（张留孙）像，诏翰林学士承旨赵公孟頫书赞，进入，上亲临视，识以皇帝之宝，以赐公生日。是日，赐宴崇真宫，内外有司各以其职供具，宰相百官咸与焉。”^[64]

元大都考古队在后英房遗址发掘出两件元代磁州窑梅瓶：一件为白釉梅瓶，通高38厘米，口径5.4厘米，腹径16.3厘米，足径13厘米，肩部有釉下彩墨书“内府”二字；另一件为黑釉梅瓶，通高31厘米，口径5.8厘米，足径11厘米，肩部阴刻“内府”二字。正如发掘者指出的，这是装内府御酒的专用梅瓶

(图16)^[65]。我们认为,这两件元代磁州窑梅瓶可能是仁宗延祐四年赐宴天师宫御酒之梅瓶^[66],后由吴全节转赠西太乙宫提点张秋泉。延祐四年仁宗命宫廷画师所绘张留孙像如今下落不明。元大都考古队在旧鼓楼大街发现过两尊元三彩道士像,高约30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67]。其中一尊(图17-1)与东岳庙东配殿张留孙塑像相同(图17-2),西太乙宫西院张留孙祠堂亦供奉此类道教宗师造像。

至元五年(1339年),吴全节七十大寿。元顺帝命宫廷画师为吴全节画像,并赐宴祝寿。虞集《河图仙坛之碑》云:“今上皇帝以特进上卿吴公全节年七十,用其师故开府仪同三司神德张真君故事,命肖其像,使宰执赞之,识以明仁殿宝而宠之,赐宴于所居崇真万寿宫,近臣百官咸与,大合乐以飨,尽日乃已。”^[68]这幅吴全节像的作者不得而知,不过,元代画家陈芝田绘有《吴全节十四像并赞图卷》。

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陈鉴如,居杭州,精于写神,国朝第一手也。”^[69]陈芝田即陈践如之子。《吴全节十四像并赞图卷》,绢本设色,长8.348米,高0.518米。每幅像均有当朝名儒题赞,卷末有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跋语。此画于清末民初流失海外,1946年丹尼尔森(Richard E. Danielson)女士捐赠给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并收藏至今^[70]。

北京旧鼓楼大街出土的另一尊元代道士三彩像,高约30厘米(图18-1)。这尊元代道士三彩像衣冠与《吴全节十四像并赞图卷》第十四图《说法像》(图18-2)颇为相似。虞集在《说法像》榜题写道:

至顺二年辛未夏,有旨大醮长春宫,公专主斋法,作《说法像》。蜀郡虞集赞:“游乎万物之表而能约已于名教,老乎朝廷之间而不濡迹于公卿;粲若华星之丽乎河汉,浩然云气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鉴,其动也祥风之时行;祠黄石者



图16 后英房元代遗址出土磁州窑内府款酱油和白釉梅瓶



图17 元大都出土张留孙三彩像与北京东岳庙道教宗师张留孙像



图18 元大都出土吴全节三彩像与陈芝田绘《吴全节十四像并赞图卷·说法像》

盖有遗书之托，衣白衣者宁辞当世之名；导冲和以辅元化，非呼吸而致长生；伊耆有巢父，轩辕有广成；则所谓宏衍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后天地齐日月，以赞于休明者乎？”

至顺二年（1331年），63岁高龄的吴全节向元文宗告老还乡，推荐门生夏文泳执掌玄教，但元文宗下诏挽留吴宗师。这年夏天，元文宗又诏令设大醮于长春宫，由吴全节专主斋法，并绘制了《说法像》。画中吴全节已经胡须花白，衣冠服饰和元大都出土吴全节三彩像如出一辙。只是外面多了一件白色法衣，可能是经筵专用^[71]。

六、张秋泉之后 两位西太乙宫提点

张秋泉告老还乡后，吴全节又为西太乙宫相继任命了两位提点。第一位是武冈（今湖南武冈市）延寿宫道士饶礼诚。揭傒斯《送武冈延寿宫真人张守静之徒饶礼诚南还诗并序》记载：“武冈扶丘山紫府延寿宫，宋张真人守静所居也，至今祷雨辄应。其徒纯真子饶君礼诚，延祐中入京师，为今玄教大宗师吴公（吴全节）所知。居太乙延福宫十五年（至顺三年/1332年），将南还山中，诗以送之。”^[72]延祐七年，张秋泉以西太乙宫提点身份到杭州处理玄教事务^[73]。如果饶礼诚于延祐中入京师，张秋泉仍住持西太乙宫。张秋泉告老还乡约在至治二年重修西太乙宫后不久。武冈延寿宫道士饶礼诚接替张秋泉出任西太乙宫第三任提点。揭傒斯《送武冈延寿宫真人张守静之徒饶礼诚南还诗》曰：

洞庭之南，扶丘之山，绵连九疑控百蛮。昔在嘉定之世，真人张氏隐居学

道于其间。祈晴即晴雨即雨，奔走郡县劳跻攀。锄云架雾开紫府，采芝种术留朱颜。夜驱猛虎守庭户，昼役鬼物除榛管。真人乘云上天去，但有青鸾白鹤长往还。云霓尚与司丰艰，尔来一百五十岁。弟子饶君通道气，一住京华十五年。太乙宫中独超异，不求逸少写《黄庭》。欲逐浮丘揽香袂，南望凄其忆故宫。黄河日与梦俱东，河流到海不复返。故宫长在白云中，天地无停机。日月无淹轨，归去乘，白云里。^[74]

大意说：张真人不得了，经他祈求，下雨天晴，老天都得听他的。他在云雾中建居所，采摘种植长生之物，使他得以朱颜长驻。夜晚猛虎为他守护庭院，白天魑魅为他割除杂草。张真人羽化成仙后，青鸾白鹤时常往来于扶丘山，雷神也乐意行司丰歉之职。武冈地区也就风调雨顺了。张真人是个老寿星，活了150年。他的门生饶礼诚亦神通广大，在京师太乙延福宫，一住就是十五年。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直迄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

《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元年九月，“以立冬祀五福、十神太一真君”^[75]。中华书局点校本将此句断作“五福十神、太一真君”。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五福太一”与“十神太一”均为太一神祇之一，姚燧《重修中太一宫碑》亦如此，可知真君在元代作为道教封号，地位介于帝君与大真人之间。刘晓认为，此处所记似应理解为在立冬日分别祭祀“五福太一真君”与“十神太一真君”^[76]。换言之，太一道和玄教祭祀对象和道场皆不同。太一道在广福万寿宫祭祀五福太一，而玄教在西太乙宫祭祀十神太一真君。至顺三年，西太乙宫第三任提点饶礼诚告老还乡，那么至顺元年在西太乙宫祭祀十神太一真君者当为第三任提点饶礼诚。

至顺三年饶礼诚告老还乡，西太乙宫迎来了第四任提点张彦辅。据陈垣考证，“道士张彦辅善画，不知为何派道士也。曰：‘彦辅君，国人，隐老子法中，善写山水。乡者侍臣有进其画于延阁，余数从讲官入直，与古画并观，几莫可辨。然其画人所罕得，鲁国大长公主好名画以自娱，张君终不肯与，他人可知已。’陈基《夷白斋稿外集》下，亦有‘跋张彦辅画拂郎马图’，盛许之，《图绘宝鉴》五，称为六一道士。《道园学古录》三，则作‘太一道士张彦辅，族本国人，从玄德真人学道，妙龄逸趣，特精绘事’云。玄德，吴全节也，太一道士何以从正一派宗师学道，观前章蔡七祖与吴宗师之关系，亦不足疑矣。述太一教人物，因并及之，以见其教之多材，且已化及蒙古也”^[77]。



图19 至正三年张彦辅绘《棘竹幽禽图》

所谓“六（太）一道士”，即太乙延福宫第四任提点张彦辅，钱塘（今杭州）人，蒙古族道士。泰定元年（1324年）以前，就赴大都师从宫廷画师商琦学画^[78]。元代文学家陈旅《题天台桃源图》曰：“天台一溪绿周遭，溪南溪北都种桃。东风吹花开复落，游人不来春水高。钱塘道士张彦辅，画图送得刘郎

去。昨夜神鹤海上来，洞里胡麻欲成树。”^[79]此诗大约作于元统二年（1334年）陈旅出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之际^[80]。故知张彦辅定居大都之前，家居钱塘（今杭州），故称“钱塘道士”。

至正二年（1342年），拂郎国（罗马教廷）遣使献马于元上都，张彦辅与周郎等人奉命绘《职贡图》，今已失传。张彦辅唯一的传世之作《棘竹幽禽图》，现藏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艾京斯博物馆（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纸本，水墨，纵76.2厘米，横63.5厘米（图19）^[81]。图上钤有“彦辅图书游戏清玩”“西字道人”二印。所谓“西字”，即西太乙宫。图左有隶书题跋曰：“子昭（盛懋字）偕周正己过太乙宫，彦辅为作《棘竹幽禽图》以赠之，时至正癸未三月十七日也，濮人吴孟思书。”至正癸未，即至正三年。吴孟思，即元代大书法家吴叡。此图还有杜本、凌翰、鞠庵、邵弘远、雅虎、林泉生、潘纯等人题跋，并钤有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近人谭敬、张珩等人鉴藏印^[82]。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征虏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陷元大都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元朝遂亡。为了防止北元蒙古残余势力反扑，明军遂将北城南缩5里，另筑新城墙^[83]。于是西太乙宫被埋于明北城墙之下，直至1972年元大都考古才重见天日。

本文得到“2017年度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特聘教授支持计划项目（IDHT20170222）”的资助。

注释

- [1]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第207页。
- [2] 王林主编：《米芾书法全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888-889页。
- [3]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3页，“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34页，注引《丞相别传》，“王导，字茂弘，琅邪人。祖览，以德行称。父裁，侍御史”。
- [4] （明）董其昌：《仿米海岳杂录》绫本手卷，民国收藏家穆藕初藏品，参见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09年春季拍卖会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网页，<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89521028/>。
- [5] （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8页上栏。
- [6] （宋）米芾：《画史》，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983页。
- [7] 沈晓筱、张居中、方晓阳：《从“研”到“砚”——论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 [9] （宋）高似孙：《砚笺》卷三，（宋）苏易简等编《文房四谱（外十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1年，第118页。
- [10] （宋）米芾：《砚史》，（宋）苏易简等编《文房四谱（外十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91年，第70-71页。

- [11] 此图引自包慕萍：《元大都城市规划再考：皇城位置、钟鼓楼与“胡同制”的关联》，《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拾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0页。
- [12] （元）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3-94页。
- [13] 吴茂云：《戴复古家世考》，《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吴茂云：《新出土戴氏家族墓志与戴复古家世新考》，《台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 [14]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 [15] （清）戚学标：《台州外书》卷三，嘉庆四年刊本，叶五下栏至叶六上栏。
- [16] （宋）戴觉民：《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0年。关于戴觉民刊刻《李白诗集》之事，参见王永波：《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 [17] （元）赵孟頫：《上脚真人张留孙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13页。
- [18] （元）赵孟頫：《上脚真人张留孙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10页。
- [19] （元）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63-964页。
- [20] （元）袁桷：《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脚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陈垣编纂，陈志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24页。
- [21] （元）虞集著，王颀点校：《虞集全集》下册《张宗师墓志铭》，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75-976页。
- [22] （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三十七，中华书局，2012年，第1683-1684页。
- [23] （明）宋濂等撰：《元史·仁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535页。
- [24] （元）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3-94页。
- [25] （元）王冕撰，王周编：《文渊阁四库书影印本《竹斋集》（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页。
- [26] （元）黄公望：《赵文敏古木幽禽图跋》，（清）吴升编《大观录》卷十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252-253页。
- [27] 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55页。
- [28] （明）宋濂等撰：《元史·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274页。
- [29] 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83页。
- [30] （元）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3页。
- [31] 诸葛净：《出世与入世——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与寺院宫观研究》，《建筑师》2006年第4期。
- [32] （元）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4页。
- [33] 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226页。
- [34] （元）邓文原：《杭州福神观记》，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54-1155页。
- [35]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 [36] 马季戈：《商琦生平及其绘画艺术》，《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
- [37] 洪再新：《元季蒙古道士张彦辅〈棘竹幽禽图〉研究》，《新美术》1997年第3期。
- [38] （元）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64页。
- [39] 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杭州出版社，1991年，第236页。
- [40] （明）宋濂等撰：《元史·商琦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2页。
- [41] （元）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4页。
- [42] （明）宋濂等撰：《元史·张九思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980页。
- [4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 [4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缘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 [4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缘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 [46]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5-116页。
- [47] 陈丽华：《螺钿漆器与衬色螺钿漆器浅议》，《文物》1997年第2期。
- [4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 [49]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2年，第81页。
- [50]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 [51] 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 [5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缘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 [5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20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41页。
- [54]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第205-206页。
- [55] （唐）崔令钦撰，任半塘笺订：《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1962年，第83页。
- [56] 张政烺：《〈封神演义〉漫谈》，《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
- [57] （明）宋濂等撰：《元史·文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750页。
- [5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 [59] （元）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7页。
- [6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 [61] （明）宋濂等撰：《元史·张留孙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8页。
- [62] 赵孟頫：《上真人张留孙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10-913页。
- [63] （元）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4页。
- [64] （元）虞集：《张宗师墓志铭》，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26-927页。
- [6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 [66] （元）袁桷：《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24-925页。
- [67] 首都博物馆编：《大元三都》，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19页。元代三彩瓷颇为罕见，但是北京门头沟区斋堂元代壁画墓出土过三彩罐和三彩炉，说明元代北京仍流行三彩瓷，参见冯恩学：《北京斋堂壁画墓的时代》，《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 [68] （元）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63页。
- [69]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05页；〔日〕近藤秀实、何庆先：《〈图绘宝鉴〉校勘与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4页上栏。
- [70] Wu Tung (ed.),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Painting from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Tang through Yuan Dynasties*,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96, pp.312-317; 洪再新：《儒仙新像——元代玄教画像创作的文化情境和视觉涵义》，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第一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 [71] 徐莫非：《用九赞乾元 犹龙师老子——〈吴全节十四像并赞卷〉研究》，西安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2-33页。
- [72]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1页。
- [73] （元）邓文原：《杭州福神观记》，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55页。
- [74]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1-252页。
- [75] （明）宋濂等撰：《元史·文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766页。
- [76] 刘晓：《元代皇家五福太一祭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5页注2。
- [77]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陈垣全集》第18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1-532页。
- [78] （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2页，“泰定元年，迁秘书卿，病归，卒”。
- [79]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页上栏。
- [80] （明）宋濂等撰：《元史·儒学传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4347页。
- [81] 海外藏中国历史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四卷《辽金西夏元》，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90-193页。
- [82] 有学者提出“子昭”可能是任仁发某个儿子，名曰任子昭，参见洪再新：《元季蒙古道士张彦辅〈棘竹幽禽图〉研究》，《新美术》1997年第3期。
- [83] 李永强：《北京考古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页。